

#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著作的不同版本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“在党的旗帜下前进”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中,陈列着不同版本的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《井冈山的斗争》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等著作,这些著作都出自毛泽东之手。透过这些著作,让人不由回想起井冈山斗争时期孕育出的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,建立农村根据地,以农村包围城市,最终武装夺取政权”伟大理论。在茫茫的黑夜中,这些理论闪耀着红色的光芒,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。



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。

有革命的发动和准备、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、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和共产党组织有力、政策不致错误等。11月,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《井冈山的斗争》(一文)中,又进一步阐明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存在和发展的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。这些条件包括:有很好的党,有相当力量的红军,有便于作战的地势,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。这几篇文章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,既否定了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,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划清界限,将武装斗争、土地革命、建立革命政权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起来,为之后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毛泽东总结红四军和其他地区红军的斗争经验,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。党的六大后,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,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,实行土地革命,建立革命政权,巩固和扩大红军和根据地。1929年1月,毛泽东、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。在途中,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》,布告指出红军的宗旨是:民权革命,打倒列强,打倒军阀,统一中华。布告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,主要有“地主田地,农民收种,债不要还,租不要送”“敌方官兵,准其投降,以前行为,可以不同”等。这份布告给沿途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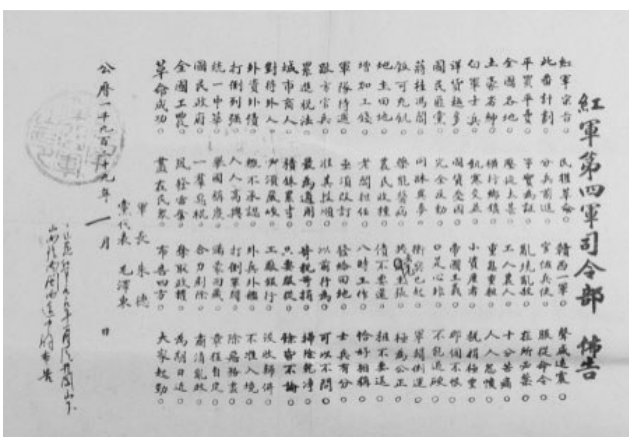
很快,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在闽赣边广大地区发动群众,开展游击战争,创建了赣南、闽西根据地。在此基础上,毛泽东提出“争取江西,同时兼及闽西、浙西”的战略计划。同年夏,红军游击战争也开始蓬勃发展。湘赣、湘鄂赣、湘鄂西、湘豫皖、赣东北……一块块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开辟建立。到1930年初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在全国10多个省的100多个县创建了大小10多块

根据地。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,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突出地位,也凸显出城市斗争始终处于困难境地。实践证明,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发展的道路,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。同时,毛泽东把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,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,开始形成“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”。

1930年1月,毛泽东在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一文中指出:“红军、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,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,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;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。”他总结各地红军、游击队、根据地建设经验,指出:“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,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,而朱德毛泽东式、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,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,深入土地革命的,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、区赤卫大队、县赤卫总队、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,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,等等的政策,无疑义地是正确的。”他还着重指明了农村斗争的意义,“必须这样,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”。这些论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上来,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,深入进行土地革命,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,待

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,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。

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,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、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,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,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路,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,建立农村根据地,以农村包围城市,最终武装夺取政权。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,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,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。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,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,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,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,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根本障碍。



毛泽东、朱德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。(据《学习时报》)

秋收起义后,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,在这段时间里,我党我军有了不少成功的经验,但也有失败的教训。更严峻的是,在白色政权的包围打压下,不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发展持怀疑态度。1928年2月,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》,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,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、不相关联的、必致失败的,要求中国共产党“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”,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,“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”。中国革命到底该如何前行,这个重大的问题尖锐而现实,急需得到回答。

1928年5月,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举办,会上毛泽东作报告,总结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,提出深入土地革命,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,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,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,初步回答了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问题。10月,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,该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便是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。文章阐述了在四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中,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,他指出,“这种奇事的发生,有其独特的原因。而其存在和发展,亦必有相当的条件”,其中包括白色政权长期分裂战争、红色政权

“茅盾文学奖”是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临终遗嘱设立的,在当时是我国首个也是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,用以表彰和鼓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。茅盾为什么要留遗嘱设立一个特别的文学奖项?



## 茅盾文学奖的由来

### 发现和培养大批青年作家

茅盾很早就从事文学评论工作,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他做编辑,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,发现和扶持了不少有潜力的新作家。青年诗人臧克家拟出版第一部诗集《烙印》,但是屡遭多个书店老板的白眼后,不得不个人出资寻求刊印,茅盾获知后,颇为感慨,认为有必要为这本诗集做点什么。他在第5期的《文学》月刊上发表文章《一个青年诗人的“烙印”》,赞扬这是一本“不肯粉饰现实,也不肯逃避现实”的来自“平凡生活”的诗集,称赞作者是“青年诗人中”最“优秀”的一个。张天翼的短篇讽刺小说《华威先生》也是经茅盾之手发表在其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(1938年4月)创刊号上,他非常欣赏小说的写法,称张天翼“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,形式上他有新奇的作风”“有别人没有的文学才能——巧妙的讽刺和新的文体”。后来茅盾在自己写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

《春天》(1949年1月《小说》二卷一期),把小说的主角干脆命名为“华威先生”,将这位“开会专家”的“两面人”暴露在“春光之下”,《春天》俨然成了《华威先生》的“续篇”。姚雪垠可谓茅盾提携的老作家,20世纪30年代他的那篇《差半车麦秸》就是茅盾发现的,他曾在一片讲话中给予这篇短篇小说很高评价。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是在茅盾的鼓励和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的,茅盾写了1.6万余字的读后感。姚雪垠说:“他是我的老师,也是真正的知音。”有人做过统计,茅盾一生评论的作家多达313人,除“五四”以来的一批老作家鲁迅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徐志摩、丁玲等外,更多的是如沙汀、吴组缜、萧红、张天翼、阳翰笙、臧克家、姚雪垠等20世纪30年代后新涌现的作家,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茹志鹃、王愿坚、杨沫、陆文夫等众多新一代作家。

### 生命为事业燃烧直至最后一刻

1978年,茅盾写了一篇“关于培养新生力量”的文章,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年轻作家的期待。他通过自己的经验,谈认识,谈感想,甚至谈技巧。同时结合20世纪50年代专业作家扎根基层,实行“三同”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,提出“生活根据地”的概念,建议年轻作家也可以有意识地建立“生活根据地”,做到“广博”“深入”,努力耕耘,提高自己。他还在《人民文学》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:“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,富于创造性的作家,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,驱遣各种体裁,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。盛世出奇才。”这里,茅盾用“奇才”寄予对新时期作家们。也是在1978年,茅盾在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,面对着新时期涌现的一批优秀作者,倍加欣慰,满怀希望地说:“我相信,在这些年轻人中间,会产生未来的鲁迅、未来的郭沫若。”言之殷殷,情之切切。当时的茅盾身居要位: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文联名誉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。然而,当时的情况,又是一个百废待兴,文艺的春天,呈现的其实还只是从冰霜冻土里刚吐出的嫩芽。1945年6月,重庆文化界为茅盾举行50寿辰暨文学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。活动现场,有企业家捐赠10万元给茅盾(后来

由于各方捐赠,奖金增加到30万元),作为茅盾文艺奖金,茅盾交给“文协”,希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。为此“文协”专门成立了由老舍、靳以、冯雪峰、叶以群等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,并发出征文启事,征集到作品上百篇,评选出甲乙丙等优秀作品。在当时这可能不过是“活动现场”的一个“小穿插”而已,但茅盾应该是个有心人,“奖项”给了他启发,他要创立一个长期的激励机制。1978年开启的优秀中短篇小说评选是在茅盾的提议下举办的,但由于种种原因,未设奖金(指初期)。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,茅盾捐出毕生的稿费积蓄25万元设立茅盾文学奖。茅盾在遗嘱里是这样写的:“亲爱的同志们,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,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,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,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我自知病将不起,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。”25万元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额,一般人也许很难理解,然而他却把它视为一种比善举更崇高的责任,他要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再燃烛火——用生命寄望,与文学同在,与青年同在。1982年12月茅盾文学奖开评,评选已逾11届,共评出优秀长篇小说53部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## 拾遗 齐白石赠画

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,但更是一位篆刻大师。所以,民间流传着许多他与刻刀的故事。有一天,一位专制刻刀的工人来到齐白石家门口,询问他是否需要制作刻刀。齐白石很爽快地回答说:“新制刻刀我暂时不需要。不过我这里有几十把旧刻刀,如果可以的话,请你帮我重新磨制一下。”说完,他就从抽屉里拿出约30来把旧刻刀交给了工人。第二天,刻刀送来了,磨得又好又利,齐白石反复端详,赞不绝口。当他问工钱费用的时候,那工人连忙说:“您的这点活儿,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怎么能算工钱呢?”齐白石说:“那怎么成?你觉得不算什么,但我做起来不知道需要多久呢!不给工钱是说不过去的。”两个人不停地客套,就这样相持着。突然,齐白石灵机一动,说道:“如

果你不要我的工钱,那就等我一下。”只见齐白石走到画案前,铺开一张五尺宣纸,拿起毛笔,饱蘸了浓墨,作起画来。约一小时后,画作完成,齐白石熟练地在画上落款盖章,并表示要将这幅画赠送给刻刀工人。那位工人受宠若惊,连忙摆手不敢当,拒绝接受齐白石的画。齐白石笑着说:“你付出的劳动,远比我的劳动花得更多!”几天后,那工人拿着画再次上门,齐白石将画打开一看,惊喜地发现工人已将画裱好,而且是全部挖装裱,裱得非常讲究。原来,他此次专程前来是想让齐白石在裱好的画轴上题个签条。于是,齐白石很愉快地为他题了签条,工人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一代大艺术家齐白石,对一位无名匠人竟能如此深情厚谊,令人感动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## 溯源

## “雅量”原是形容酒量大

宏大宽容的气度称作“雅量”,《世说新语》中有“雅量”这一篇目,就是记述当时人的这种气度。最能说明这种气度的是嵇康:“嵇中散临刑东市,神气不变,索琴弹之,奏《广陵散》。曲终,曰:‘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’”然后从容就死。这就叫“雅量”。“雅”的本义是一种鸟类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雅,楚鸟也。一名鸞,一名卑居。秦谓之雅。”段玉裁辨析道:“楚鸟,鸟属,其名楚鸟,非荆楚之楚也。”“雅”既为鸟类,于是古人顺理成章地把酒器制成“雅”的样子,就像“爵”是模仿“雀”的形状一样。魏文帝曹丕所著《典论》中说:“刘表子弟有三雅之爵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四十五引《典论》佚文:“刘表有酒爵三:大曰伯雅,次曰仲雅,小曰季雅。伯雅容七升,仲雅六升,季雅五升。”卷四百九十七引《史典论》曰:“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,子弟骄贵,并好酒,为三爵:大曰伯雅,次曰仲雅,小曰季雅。伯受七升,仲受六升,季受五升。”伯、仲、叔、季是古人对兄弟从大到小的排行次序,刘表及其子弟将酒器按照容量大小依次分为伯雅、仲雅、季雅三种,此之谓“三雅”。据北宋学者温革所著《隐居杂志》载:“闽州有三雅池,古有修此池者,得三铜器,状如酒杯,各有二篆,曰伯雅、仲雅、季雅。或

谓刘表一子好酒,常制三爵,大受一斗,次受七升,小受五升。赵德麟云恐是盛酒器,非饮器也。”可见宋代时四川阆中尚有“三雅池”的名胜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二十七引《东观汉记》,记载了东汉大臣吴良的事迹。吴良是齐国临淄人,任郡吏,这一年正月初一,众官员去向太守庆祝新年,有一位叫王望的官员大拍太守的马屁:“齐郡败乱,遭离盗贼,人民饥饿,不闻鸡鸣狗吠之音。明府视事五年,土地开辟,盗贼灭息,五谷丰熟,家给人足。今日岁首,诚上雅寿。”“明府”是对太守的尊称。这一番话说完,众官员“皆称万岁”。吴良一听大怒,指出“盗贼未弭,人民困乏,不能家给人足”的现实,要求太守“无受其觞”。太守听从了吴良的进谏,“遂不举觞”。王望口称的“雅寿”一词,是指举起叫“雅”的酒杯祝寿;太守“不举觞”,也证明“雅”就是一种酒器。清代学者袁枚所著《随园随笔》中有一则《雅量之讹》,就对此进行了辨析:“《汉志》:‘请上雅寿。’注:雅,酒爵也。即刘表酒器三雅之‘雅’。盖群臣上雅爵以介寿耳,非云酒量大也。今称人善饮为雅量,误矣。”大杯称“鬯”,可见“雅”的容量确实很大。清人翟灏所著《通俗编》中写道:“世称雅量,谓能饮此器中酒,不及醉也。”可见清代时人们已经把善饮、酒量大称作“雅量”了。袁枚虽然纠正说“今称人善饮为雅量,误矣”,但早已约定俗成。由酒量大引申而为气度宽宏,乃属顺理成章之事。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## 古代的文字密码锁



清代文字密码锁。

在中国古代,虽然还没有现代科技的辅助,但人们的智慧却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创新,其中一种令人称奇的就是密码锁。尽管文字密码在现代社会广泛应用,但古代的密码锁则更多依赖于文字和符号。有一种常见的古代密码锁类型,是利用精黄铜打制的横式圆柱体。这把清代的文字密码锁,长度约16厘米,锁梁粗而短,锁身有四个小拨轮。每个拨轮上刻有不同的铭文,从左到右依次是“除非神来,要得巧开。老君下来,此锁为怪”。另外还有“口、岳”二字刻写在锁身左右两边。这款锁的设计寓意着锁身如同山岳一般坚固,不易开启。当主人想要上锁时,他会先在四个拨轮的铭文中,挑选出一个字,这样总共可以组成四个字的密码。然后,他把这个密码记在心中,转动拨轮打乱文字,使得这个密码更难被破解。当需要开启锁时,他只需再次转动拨轮,让选定的字正对锁梁。当四个字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,形成一句完整的句子,锁就会顺利打开。这种文字密码锁的设计,让那些没有文化的小偷感到无比的棘手。因为面对陌生的文字,他们可

能会产生敬畏的心理。尽管他们可能会尝试一个字一个字地试,但这样的工作量巨大,而且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方式,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正确的密码。密码文字锁的文字选择,也体现了主人的个性和兴趣。许多密码锁上,就刻上了一些吉祥的词语和诗句,既表达了主人的美好愿望,又使得锁更具保护功能。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才华。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,密码锁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演变。然而,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密码锁的核心目的都没有改变:那就是保护和防盗。无论是用数字还是文字,密码锁都是一种精妙的防卫机制,它需要主人的智慧和细心来设置,也需要同样的智慧和细心来破解。古代的密码锁是一种兼具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的发明。它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,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。作为收藏家,我们珍视这些古代的密码锁,不仅因为它们独特的历史价值,更因为它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和文化的记忆。(据《联谊报》)